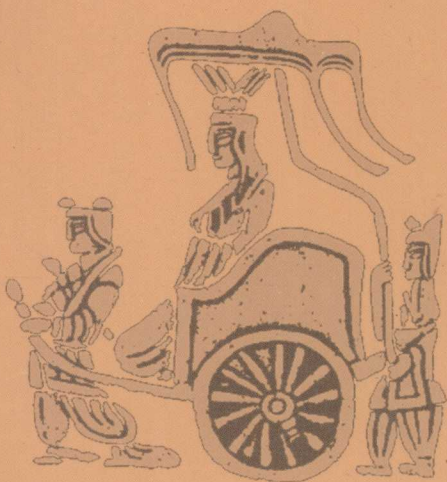


张承宗 著

上 编
史学与文化
研 究



吳門探史錄

孝萱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上 编
史学与文化
研 究

张承宗 著

吳門探史錄

孝萱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门探史录/张承宗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 - 7 - 207 - 08165 - 0

I. 吴... II. 张... III. 史学—文集 IV. K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930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张 巍

装帧设计:李 梅

吴 门 探 史 录

Wumen Tanshilu

张承宗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31

字 数 900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165 - 0/K · 964

定 价 70.00 元(全二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代序：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

——与研究生谈史学工作的体会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的合并与扩大招生，研究生的数量明显增多，但其综合素质有所下降，学问根底也有所不足。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时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个在当时曾经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而现在已经退休的老教师，我感到有必要与目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谈谈自己从事史学工作的体会。

一、在前人的基础上学步

从学习历史到教历史课，再到研究历史，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从 1960 年进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到 1964 年毕业后参加工作，又经过 14 年的坎坷和摸索，到 1978 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才开始了我的研究历史的学步。当时我已经是 35 周岁的中年人，深深感到时间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多，必须努力追赶。既然要努力追赶，就必须如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的“善假于物”，也就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尽量少走弯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处于开创阶段，延聘了许多全国著名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来帮助指导研究生。于是，历史系主任熊德基先生、导师尹达先生就决定让我到上海，接受吴泽先生的委培，专业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学史。

这一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吴老以身作则，积极投入，为我们树立了历史研究要经世致用的榜样。吴老讲课与作学术报告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史问题、历

史研究与实践标准问题、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与任务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我深深感到跟这样的导师学习,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吴老十分重视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研究历史。当时,他领导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室正在编选《中国史学史论集》,就让研究生一起参加校对工作。通过校对,熟悉史料,进一步了解前人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就,为我们的学习起步开了个好头。在目录学的训练方面,吴老让我们去旁听古籍整理专业的版本目录学课程,又请谢国楨先生给我们讲明清版本目录学。后来,他与杨翼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也都让研究生一起参加。这样边干边学,不仅接触到了更多的古籍,还在讨论中聆听到许多史学前辈的高论,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对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无论是作业论文还是毕业论文,吴老都放手让研究生自己选择,给予充分的选择余地,以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当时华东师大中国史学史研究室的老师们,已经编出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学家著作的油印目录。吴老让我们研究生再编一份研究这些近代史学家的已经发表的论文的目录。通过这两份目录的对照,使我们知道哪些是研究的热点,哪些是研究的冷门与空白。吴老特别鼓励我选择冷门,填补空白。这样做的好处是必须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写出来的论文不会变成重复劳动,而且有价值、有新意。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写的第一篇作业《龚自珍史学研究》,是一篇全面评价龚自珍史学的论文,得到吴老的首肯而收入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第二篇作业《鸦片战争史的通俗演义——〈罂粟花〉》,是配合吴老为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撰写再版前言收集资料而写作的,也是吴老推荐发表的。后来撰写的长篇论文《叶德辉的政治生涯与学术活动》、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缪荃孙的史学成就》,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吴老的教诲。

研究生毕业后,我执教于苏州大学历史系,还是沿着前人的基础推进,在中国史学史的领域继续探索。我参加了尹达师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编写,后来还应邀参加了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的编写。与人合作出版了《叶德辉评传》,主编了《青峰学记》(柴德赓纪念文集),对柴德赓与陈垣的师生

关系、学术渊源作了探讨。我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有对魏源、张穆、何秋涛、姚莹、俞正燮、王韬、唐才常的个案研究,也有对鸦片战争前夜的边疆史地研究、戊戌变法前后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清代的扬州学派、清代的元史研究、《碑传集(附续、补、三编)》评介、《文史研究的交叉与创新》、《新史学的回顾与前瞻》等综合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把研究重点放在清代与近代学术方面,反复阅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同时参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中受到许多启发。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了解清代学术,开启治学门径,由博返约,由约转精,力求融会贯通,学贯中西,识通古今,去伪而存真。这样高的目标,对于我来说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只能是心向往之而力求之而已。

我从20世纪80年代在苏州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90年代起又在中文系(基地班)与历史系讲授史学概论。由于教学的需要,视野也逐步拓宽到古代史学,并开始涉及外国史学流派。这方面做的研究工作还不多,已发表的论文有《〈新五代史〉徐无党注述评》、《〈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学术价值》、《黄宗羲与〈明儒学案〉》等。

二、开拓新领域的尝试

我在苏州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必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其所以作出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出于下面三方面的考虑:

1. 由于我原来的专业是中国史学史,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一定基础。在原有的基础上涉足相关领域,拓展研究范围,自然比较方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韩愈云“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如打一场新的战役,必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购置图书极为必要。从陈高华先生等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史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史料有七个特点:一是正史在历史资料中占最重要的地位,二是私史众多,三是史注之风盛行,四是传记和谱学兴盛,五是地方志发达,六是佛教、道教史料涌现,七是总集出现。我感到若按图索骥,量力而行,选择这一段历史下功夫,大部分资料是可以

搜集到的。

2. 当时我在历史系担任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任务,主要是从原始社会讲到隋朝以前,只有在其他院系讲课才一直讲到明清。所以结合教学,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从六朝史研究着手,逐步向整个魏晋南北朝史拓展,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3.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我原来从事的清代近代史学研究,虽说隔了很长的时段,但这两个不同时段都属于社会的转型期。历史变迁的规律,古今虽然不尽相同,却有相似相通之处,可以互相比较,有所启发。武汉大学的姚薇元先生,早年治魏晋南北朝史,撰有《北朝胡姓考》;后来负笈英伦,搜集域外史料与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互证,撰《鸦片战争史实考》。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曾经到武汉访书,得到过姚先生的帮助。我对姚先生十分敬仰,既然我们的前辈能从魏晋南北朝转到清代近代,我为什么不能从清代近代转到魏晋南北朝去呢!

凡是打定了主意的事情,就得赶快行动。1983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得到198元稿费,这相当于我当时三个半月的工资。这笔钱就成了我购置魏晋南北朝历代正史、《资治通鉴》和各种史料书的启动资金。当年与人合作编写了《北魏立三长行均田时间研究综述》。1984年出席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聆听了诸位前辈和中青年学者的发言,给了我很大启发。1985年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在学会的推动下,我走上了研究六朝之路。1986年我承担并主持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六朝史》的编写。拟出大纲后曾向唐长孺先生请教,听取过唐老的意见。后来,在教研室全体同志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了任务。唐老题签书名。吴泽珩撰写序言。全书结语是请卞孝萱先生写的。事后我感到该书对文物考古资料的运用有所不足,于是就决定在这方面狠下功夫。20世纪90年代起,我在苏州大学历史系开设六朝史选修课,参加李学勤先生等主编《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编写,就尽可能运用文物考古资料来补充论证。世纪之交,我又将文化史的研究向风俗史拓展,尝试利用文学材料,“诗文证史”。与人合作完成陈高华先生等主编《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及《中国服饰通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编写。在《六朝民俗》出版后,我又转向妇女史的研究,现已与人合作完成《中国

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书稿。此外，我承担的《中国旅游文化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编写亦已完稿。这两种著作，都已交出版社，正待出版。

在写书的同时，我还陆续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属于历史文献与史官制度研究的有：《〈四库全书〉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王鸣盛对南北朝史的校勘》、《王国维与〈魏石经考〉》、《〈魏书·序纪〉的史学价值》、《〈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荆楚岁时记〉与六朝南方风俗研究》、《六朝宗教人物杂传述要》、《南朝史官制度述论》等。这是有意识将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相结合，力求更全面地掌握史料的价值。

属于思想文化研究的有：《魏晋经学的演变》、《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东吴学术散论》、《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六朝教育格局的多样化》等。将经学与玄学交叉起来研究，力求揭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创新，也更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属于人物、家族及社会群体研究的有：《三国“吴四姓”考释》、《吴地人士与东吴兴亡》、《蜀汉人士与蜀汉兴亡》、《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拓跋珪发展战略探析》、《兼资文武的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一代雄主拓跋焘及其晚年悲剧》、《论北魏前期的“新民”》、《试论杨坚家庭关系与隋朝的灭亡》等。

属于区域经济文化与战略地位研究的有：《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侨州郡县与长江流域的加快开发》、《六朝交通路线述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建筑》、《六朝时期的江南园林》、《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梁魏朐山之战与郁州之争》、《坊头之战与南北政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等。

属于社会风俗研究的有：《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与南北民俗的交流》、《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魏晋南北朝医药与服食养生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礼俗》、《六朝时期蚕桑丝绸棉布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六朝音乐与舞蹈》、《魏晋南北朝婚俗初探》、《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宗教服饰》、《北魏时期洛阳地区的佛教》等。

属于妇女研究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服装》、《三国两晋南北朝宫女考略》、《北朝宫女考略》、《六朝江南妇女的经济活动》、《十六国后妃考略》、《三国妇女参政考》、《魏晋南北朝妇女从军考》、《魏晋南北朝妇女的社交活动》、《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等。

通过以上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试图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格局，力求立体而细化地再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真正写人的生活与人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学家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凡例》中，就曾将中西史学的不同特点加以比较。他认为欧洲古代，“素无史职，记载阙如”，到近代始有“私史”，其搜罗佚事，网举旧闻，又往往“惟纪国俗、物产、舆地”，而“事实未备”；中国史书“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对“国势民情”却略而不讲。相比之下，“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觐人才之进步、制作之源流”，这是西史的优点，“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在《法国志略》的编撰中，他吸收西史的长处，以“广述”的形式，专载有关通商、军政、物产、民俗、文化等各方面的琐事逸闻。王韬是中国近代走出吴中，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他在史书写作上是有创新精神的。我最初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王韬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在《史学概论》的教学中，涉猎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对其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十分心仪。法国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是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关键，强调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平等而独立的地位，重视跨学科的总体研究，尤其重视经济、文化、民俗、心理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长时段影响。这些认识，正合我心。我把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相当的长时段，把当时南北对峙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作为相对的两大区域，逐步研究其间的分合、异同、变化，并提出问题加以比较。目的在真正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王朝兴衰为中心的政治史的束缚。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与逐步中国化，也启示我认识到史学工作者在学习国外的史学方法时，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民族风格。我的这些尝试，还只是初步的。摆在我面前学术的路，还很长、很远，还要继续努力探索。

三、普及历史知识，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

普及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地方文化研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也都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做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历史辞典的编写，如吴泽、杨翼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吕西安·波雅主编《各国大史学家辞典》（英文版）、袁英光先生主编《南朝五史辞典》等。二是参加朱仲玉先生主编“中国历史知识全书·灿烂文化”系列《中国古代音乐》的编写，使我对传统民族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三是参加卞孝萱先生主编《资治通鉴新编》魏晋南北朝部分的编写，使我对《通鉴》的内容也更为熟悉。

我曾经在苏州大学历史系旅游专业创办时期，后来又在外语系旅游英语专业，多年开设中国园林学的课程，结合苏州园林讲解与园林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在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方面，我撰写了《对江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汇编了一本以六朝与近代为主要内容的《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的论文集。与研究生合作撰写了《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完成了《吴文化与其它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台湾东吴大学的《东吴历史学报》发表了《吴文化演变的历史考察》，以增进两岸的文化交流。

四、几点体会与思考

从我从事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 40 余年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大致有下列几点体会与思考。

一是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坚持经世致用，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史学工作者的个人命运，是与民族的兴衰、国家的治乱、时代的潮流、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考察社会、研究历史的契机。凡是遇到历史与社会的大转折、大变化，必然会产生伟大的史学家出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的前进。今天，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历史大势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不仅经济上农业社会要向工业社会转型，还有政治法律

上人治社会要向法治社会转型,人权心态上臣民社会要向公民社会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一元社会要向多元社会转型。这些社会转型的实践,必然会使人们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以往的历史必然会被不断地重新评估,并不断地重写。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之中,正可谓“生逢其时”。史学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探索。1949年10月燕京大学法学院出版的《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刊载了齐思和先生撰写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其中在论证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之后,又曾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但改变了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此时历史家也提倡历史相对论了。十九世纪自命为科学的历史家,以为历史的目的是求历史上绝对的真理,在现代史学家看来已近于不可能了。无论研究者的态度如何客观,方法如何谨严,但是在选择材料上、解释事实上历史家不知不觉地受了时代环境、个人主观的影响。历史家所得到的一切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真理,因之历史家的工作,和其他科学家的一样,永远没有完。”齐思和先生的这段话,含义十分深刻,可惜后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的逐渐一统与僵化,史学家们再也不敢提历史的相对性了。此文在收入《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时,把标题改为《晚清史学的发展》,并删去了好多涉及史学发展的内容。今天看来,实在没有这种删削的必有。历史与历史学的相对性应该为史学工作者所认识。

二是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求真求实。按我个人的理解,文、史、哲、经、法,各有分工,各有永恒的主题。文学永恒的主题是“爱与恨”,是描绘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史学永恒的主题是“真与伪”,是把历史真相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还是伪造历史欺骗世人及后人。哲学永恒的主题是“生与死”,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肉体消失了,究竟还有没有灵魂?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是“贫与富”,是财产如何增值?如何分配?法学永恒的主题是“严与宽”,法要人遵守,又法不责众,才切实可行。基于以上考虑,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永远需要考证。史学就是考据之学。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神化自己往往要伪造历史;为了压迫不同政见者,制造冤假错案,也要伪造历史。历史遗迹、文物、古籍等等,因战乱或各种人为的因素也会遭到破

坏、湮没，或篡改。为了复原历史的真相，都需要考证。历史虽然是人写的，但人写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毕竟是有差异的，而弄清真伪就是历史学家永远的责任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三是对前人行之有效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要努力学习，还要身体力行，反复实践，不断创新。从20世纪前半期起，中国的史学研究方法开始出现多学科交叉的新格局，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结合，使史学研究的科学水平空前提高，出现了一批史学大师，并形成流派。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与甲骨文研究、陈寅恪的“诗文证史”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民俗研究、郭沫若的历史辩证法与古代社会研究、陈垣的历史文献学与宗教史研究，等等，代表了当时各不同流派的最高水平。专门探讨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著作，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等。20世纪各断代史与专史的名家，也大多涌现或成长于这个前半期。20世纪后半期，文物考古与民族调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史学方法上环绕“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有过很多争辩。今天看来，两派的争论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无非前者主张用演绎法，后者主张用归纳法。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严重束缚了史学工作者的手脚，很难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文革”期间，历史学服从于长官意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涌现，史学的商品化趋势逐渐抬头。盲目照抄照搬外国史学流派与方法的现象有所出现，而封建的帝王心态泛起的沉渣也在污染着人们的视野。层出不穷的戏说历史的宫廷电视剧，不仅艺术创作方法低劣，而且毫无科学性可言。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应该用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正确引导读者与观众。

四是任何人选择职业，总要受到社会、家庭、个人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史学工作者的研究领域，也不可能完全是由自己选择和永远不变的。回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想攻读世界史。但后来历经坎坷，身居僻壤，外语荒疏，于是就调整方位，报考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录取在中国史学史专业，导师又确定我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学。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执教于苏州大学，又被安排在中国古

代史教研室。1986年,我开始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并着手组织开展六朝史的课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读到唐长孺先生《山居存稿·跋语》,其中说:“我早年治辽、金、元史。……在治学过程中,我深感到自己缺乏治辽、金、元史必要的古少数民族语言及外国语基础,很难深入研究。至40年代中期,由于教学需要,专业转向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此后再也没有重理旧业。”在唐老现身说法的启示下,我感到自己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治学方位后,应该相对稳定。90年代初,又读到田余庆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前言》,其中说:“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从此,我更认识到“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重要。我的学术基础远远不如前辈,就以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主要研究领域,一辈子也难以做出多少成绩。如今,我已经退休。历史教学已不再是我谋生的职业,而历史研究却依然是我的一种事业。

五是要学会与人合作。学术研究与各项工作一样,需要与人合作。是否善于与人合作,对一个人的成长极为重要。第一是与前辈及师长的合作,一般说来比较容易做到,只要晚辈谦虚谨慎就能合作愉快。第二是与同龄人的合作,往往有一定难度。同龄人在一个单位或相同领域,往往处于竞争状态。目前评定职称及评奖的各种名额限制、量化指标、条条框框,又往往加剧各种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当事人有一种平和的心境,要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而荣辱不惊。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需要人生的不断修养与磨练。第三是与学生及年轻一代的合作,也很重要。年长学者热情帮助年轻学者,是学术薪火相传的一种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相长,必然相得益彰。孟子在《尽心上》篇中,曾经说君子有三种乐趣。第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第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反复强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就是说“王天下”的统治者是没有这三种乐趣的。其实,孟子所说的这三种乐趣,一般人也不能完全得到。只有做教师的人,才能有第三种乐趣。历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将来很多人要从事教育工作。当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从事教育工作之后,一定也会有许多切身的体会。

原刊于《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教学研究专辑(下)

目 录

缅怀先贤

学习尹达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读《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体会 (3)

读郭沫若给尹达的一封信 (36)

史学评论

文史研究的交叉与创新 (41)

新史学的回顾与前瞻 (59)

要重视史学流派的研究 (68)

半个世纪前的一桩学术公案

——对尚钺批判的回顾与反思 (80)

史学史研究

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史学 (167)

《魏书·序纪》的史学价值 (174)

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188)

《四库全书》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5)

《新五代史》徐无党注述评 (219)

清代的元史研究 (232)

黄宗羲与《明儒学案》 (248)

南明史研究的新局面 (257)

龚自珍、魏源的史学思想与史学研究的新风气 (263)

鸦片战争前夜的边疆史地研究 (270)

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	(279)
西学的传入与“新学”的兴起	(287)
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观	(292)
戊戌变法前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	(299)
《书林清话》与书史研究	(312)
《藏书十约》与编刻家集	(321)

江南文化研究

对江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代序	(335)
吴文化演变的历史考察	(347)
季札及其故里延陵考略	(377)
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	(391)
六朝交通路线述论	(400)
六朝时期的江南园林	(411)
六朝教育格局的多样化	(425)
六朝音乐与舞蹈	(438)

读史札记

汉代的“家人子”	(455)
喜爱音乐的皇帝——李隆基	(457)
关于史朝义之死	(459)
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	(461)

书 评

读《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	(469)
别开生面 辛勤探索	
——读《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472)
读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三卷本感言	(475)
新教材的编写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读张连生新编《史学论文写作》有感	(479)



緬懷先賢

